

「發展傳播」與「全球化／數位化」： 是否相互矛盾？

John A. Lent* / 譯者：劉昌德**

有關「全球化與新資訊科技可以改善南半球赤貧人民生活」的說法，雖然目前不再像過去那麼流行，但仍時有所聞。現在比較盛行的說法，則是「全球化與新科技將可打造一個所有人類與國家互動連結的地球村」。不過，當前全球化與新科技所帶來的實際現象，像是令人厭煩的不停用手機與電子信件閒聊，網路與電腦遊戲等所衍生的狹隘的虛擬生活經驗，以及使人們耽溺於個人的物慾追求的線上消費與其他行銷策略等等，卻不像上述這個論點看起來那麼高尚與具有包容性。

把全球化與新資訊科技，奉為過去稱為「第三世界」地區（這是個不怎麼好聽的名詞）的救贖，不過是老生常談。這種說法，其實是新瓶裝四十年前的舊酒。早在一九六〇年代的「發展時代」，一群美國社會科學學者，便曾經大力提倡「現代性」與電視及廣播等新傳播科技，將可以改善「未發展國家」（稍後改成「發展中」與「較低發展」國家）數十億人民的生活。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回顧「宣稱大眾傳播可刺激社會發展」此目前仍持續討論中的議題之歷史。透過此參雜個人觀點與經驗的文獻整理，我想

*John Lent 任教於美國 Temple University 教授，通訊地址為 669 Fernside Blvd. Drexel Hill, PA 19026, USA。本文為 Lent 教授在 2005 年 11 月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舉辦的「第二屆數位傳播國際研討會」之大會專題演講稿全文。

**劉昌德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telcdl@ccu.edu.tw

要回答的問題是：「發展傳播」與「全球化／數位化」，是否根本就是兩個相互矛盾的詞彙？

早期的發展傳播運動，以 Wilbur Schramm、Daniel Lerner、與 Everett Rogers 三位學者為主要倡導者，並與早期的「發展新聞學」(development journalism)有所關連；雖然兩者取向不盡相同，但是都把改善社會底層人民生活視為己任。我自己則是支持 Freire 與 Schumacher 等人的觀念，而成為發展傳播的早期批評者之一。

當我 1964 年到菲律賓時進行研究與講學時，並沒有讀過 Schramm、Lerner 與 Rogers 等人有關發展的著作。在那裡，我與當時剛成立的「菲律賓新聞機構」(Philippine Press Institute，簡稱 PPI) 會長 Juan Mercado 一起合作，參與 PPI 初期的活動，希望把當地煽色腥且菁英取向的新聞媒體，扭轉為具有社會意識、對社會有用的「大眾」媒體。Mercado 最初的作法，是邀集菲律賓新聞工作者參與一系列的研討會，讓他們吸收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的觀念與資訊的同時，也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在約一週的系列研討會中，凝聚促進社會變遷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後來也成為發展新聞學的源頭。

隨後 PPI 在 1960 年代大力倡導「發展報導」的觀念，而亞洲其他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也逐漸認識到必須以新的方式來報導亞洲事務。因此應運而生的「亞洲新聞基金會」(Press Foundation of Asia，簡稱 PFA)，在 1968 年首創「發展新聞學」此一名詞，並舉辦一系列研討會，希望增進媒體對「肩負亞洲發展與區域合作責任者」的認識，以及開辦發展報導的訓練課程。PFA 也設立專屬的新聞通訊社「深度新聞社」(DEPTHnews)，作為發展新聞的訓練與宣導之用。我個人在 1972 年到 1974 年之間，擔任了衍生自 PFA、總部設於可倫坡的「東南亞新聞中心」(South East Asia Press Centre)在馬來西亞開辦的第一個大眾傳播學術

課程的主辦人。但就在那時候，當地政府開始接收發展新聞學，並且把這個觀念轉化成為「政府主導的新聞學」(government-say-so journalism) (參見 Lent, 1997)。

當然在此之前，有關這個主題還有 Daniel Lerner (1958)、Wilbur Schramm (1964)、Everett Rogers (1962)、以及 Ithiel de Sola Pool 與 Lucien Pye 等人的著作。這些學者提出包括「傳統社會的消逝」、「創新傳布」等觀念，透過對大眾「由上而下」傳播模式的探討，強調如何達成西方觀點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層面的現代化。這批接受美國政府經費資助與協助、而與之過從甚密的學者，認為電視與廣播等「新」資訊科技，是解決南半球窮國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他們深信，只要提供給窮國人民這些媒體，人們就會開始有所意識，然後改變態度與行為、或遷入都會區，隨之知識與政治意識都開始增進，因此逐步改善生活。現代化學者認為，媒體發展程度是社會整體發展的一項指標 (參見 Thussu, 2000:56-60)，並且「將發展定義為依循西方工業化與『現代化』模式，主要以社會產出或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經濟成長率為測量標準」(Thussu, 2000: 58)。在冷戰時代下，大部分的現代化研究都具有政治動機，企圖把南半球的新興國家納入資本主義陣營。

從此，協助「第三世界」發展的觀念逐漸變質。拉丁美洲學者因而率先發難。Paulo Freire 在 1972 年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提供了不一樣的觀點。首先，Freire 認為，即便人民身處在備受忽視、貧窮、與剝削的壓迫環境中，他們還是具有學習、成長、與自我教育的能力。第二，Freire 主張要直接接觸人民的真實處境，並且分析與瞭解社會結構及官方意識型態所產生的限制。第三，超越「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區分，把彼此都放在學習的過程中。第四，要有自由的對話。第五，參與解放的行動。總結來說，「反現代化」論者強調資訊的

水平互動、而非由上而下的灌輸，重視傳統媒體與人際溝通管道，並且拋棄以經濟為發展主要指標的想法，尊重人們不同的價值、信念、態度、與社會需求，將之視為「發展」的各個環節。

在 19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初期之間，同樣來自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學者指出：

總公司大都設在北半球富國的跨國企業，藉著這些政府的支持，透過掌握市場、資源、生產、與勞動力等方式來主導全球貿易，進而控制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發展，其實是在加強已發展國家的宰制、以及讓發展中國家「邊陲化」與持續依賴的架構中進行 (Thussu, 2000: 61)。

傳播學界中的依賴理論觀點，受益於帝國主義論者的啟發，尤其是 Herbert Schiller (1969) 所揭示的西方大型財團如何與政府及軍事結合，破壞了南半球國家的文化自主性，導致了文化與媒體的同質化及依賴關係。

我在加勒比海與東南亞地區所進行的相關研究，於 1974 年發表於「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簡稱 IAMCR)，也屬於這場對話/辯論。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發展中」地區常會碰到的四個問題：錯誤的科技與經濟移植、媒體帝國主義、政府對發展新聞學的介入、以及分析傳播過程時對鄉村人民的忽視 (Lent, 1974)。據 Kaarle Nordenstreng 轉述，這篇文章也成為「不結盟國家運動」(Non-Aligned Countries Movement) 在 1974 到 1975 年間有關傳播研究的參考資料之一。之後我在一些文章中持續拓展這些概念，例如主張將大眾媒體「鄉村化」。我借用 E. F. Schumacher (1973) 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一書中的概念，呼籲在鄉村地區

的傳播活動，必須以小規模、低資本、簡單、非暴力、以及漸進等原則進行(Lent, 1978)。

現代化論者的研究，因為其科技決定論（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觀念及實證工具取向等問題，在 1970 年代受到更猛烈的抨擊(Servais, 1985)。同時，現代化理論也被批評為誤認媒體效果有「近乎催眠」的力量，且天真地以為「第三世界」社會的閱聽人都是消極被動與無力自主的鄉巴佬(Krippendorff, 1979)。部分現代化理論陣營的學者，也開始反省自己的研究。Everett Rogers 似乎就接受了 Freire 的一些觀點，而修正了他對「發展」的定義。1969 年時，Rogers 認為新觀念引進之後，可以「透過較現代的生產方式與較精良的社會組織來提升國民收入與生活水準」(Rogers, 1969)。但到了 1978 年，他重新定義「發展」為：

是一個社會變遷的廣泛參與過程…使人們更能夠掌握環境，因此為大多數人們帶來社會與物質的進步（包括更為公平、自由、以及其他各種更高價值）(Rogers, 1978:68)。

另外，Wilbur Schramm (1979: 1)則反省認為，他應該要「對西方發展模式的適用性多一些質疑」，因為這種發展模式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history-specific)與許多缺陷。

1970 年代是討論有關「大眾傳播在國際傳播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顛峰時期。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與「不結盟國家運動」所舉辦的會議中，有許多相關的討論，主題包括文化帝國主義，資訊自由流通，有關資訊、通訊衛星、和平、安全、宣傳的各種權利與自由，以及理所當然會提到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打從 UNESCO 設立初始，便與「協助發展」有緊密關係，特別是科技硬體與軟體的轉移。

這兩個組織、尤其是不結盟國家運動所舉辦的無數的會議，紛紛鼓吹「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運動（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簡稱 NWICO）。NWICO 運動的緣起，事實上與建立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有所關連，這個運動企圖取代「不平等、宰制、依賴、狹隘的私人利益、與分裂社會」的主流經濟秩序。所謂的新經濟秩序，是促進「不同經濟與社會制度的所有國家，都能夠平等、自主、互賴、互蒙其利、以及互相合作」（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在紐約所發表的《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引自 Carlsson, 2003:39）。不結盟國家在一九七六年所召開的會議中，「資訊」成爲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Carlsson(2003: 40)認爲，NWICO 的起因是由於：

國際新聞流通的不均衡、或可統稱為「單向流通」(one-way-flow)，不尊重對第三世界人民文化認同，跨國媒體財團的壟斷地位對國家獨立自主造成的威脅，以及世界傳播資源的不公平分配等等，都造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不滿，而促成了此一運動的產生。

UNESCO 正視此一問題，在 1976 年時組成了一個後來通稱爲「馬克布萊德委員會」(MacBride Commission)的單位，進行調查與研擬政策建議。這個單位在 1980 年提出《一個世界，眾聲喧嘩》(*Many Voices, One World*)的報告，主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並建議這些國家應該要朝向獨立自主、建立本身文化認同的方向來「發展」。

但是，NWICO 這些努力，很快地在 1980 年代便被丟入舊紙堆。首先是美國與英國退出 UNESCO，然後是不結盟國家運動的沒落，以及資訊時代和全球化的來臨。同時，發展傳播這個老舊典範，換了個面具又捲土

重來，依舊強調媒體效果（這次是衛星與電腦）、由上而下的資訊流通、以及經濟成長。這個帶了新面具的舊典範，同樣是由美國政府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美國企業與學界所倡導，不過現在討論的議題則成了如何在鄉村推廣「赤腳晶片」(barefoot microchips)、讓農民使用電腦(Casey-Stahmer, 1985:61)，結合新科技使用的發展傳播政策如何較為符合成本效益觀點(Jussawalla, 1985:66)，電訊設備如何使得地廣人稀的阿拉斯加州居民得以互相聯繫，以及如何使電話在鄉村地區更為普及 (Missing Link, 1984)等等(參見 Lent, 1988)。

一些學者對於上述觀點抱持負面態度。Jayaweera (1985)就說明了整個學界的討論如何倒退回到 1950 年代：

如今第三世界「擁抱」衛星科技的作法，正在重蹈一九五〇年代傳播政策的覆轍：這樣的作法，隱含了「讓人們接近資訊與知識、以促進相關認知，是發展過程的基礎」的假定…這種重新擁抱「心理認知」的觀點，代表了不願意從結構層面來正視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現在傳播學界對剛萌芽的衛星傳播的幻想，與一九五〇年代對當紅的廣播與電視的天真想像並無二致。顯然，他們是希望這種炫目的新科技設備，可以撲滅第三世界人民要求結構性改變的急切需求。

Jayaweera 進一步論稱，衛星會把邊陲國家跟中心國家更緊密地綁在一起，然後「同時加劇依附與加強宰制」。

基於相同的想法，我質疑一些有關推展新資訊科技的迷思，這些迷思包括科技將可以（一）打造「地球村」；（二）增進國際間的瞭解與和平；（三）促進獨立自主與民主觀念（參見 Roszak, 1986）；以及（四）拯救第三世界人民(Lent, 1986)。尤其是有關最後一點，我曾經主

張、且依然堅信，新資訊科技在第三世界的傳布與發展，其背後的趨力是商業利益而非人道主義。

上述的討論，可以啟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到底把「發展傳播」與「全球化／數位化」放在一起，是不是一個矛盾的想法？以上我所提供的一些現象，以及我描述這些事情的筆調，應該已經說明了我的立場：我不相信全球化及所謂的資訊社會，對於被稱為第三世界地區的社會問題，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解決途徑。

我之所以質疑這些說法，是基於下列幾個原因：

(一) 全球化主要是為了推廣資本主義，而非為了造福貧苦大眾。最早開始宣揚這個觀念的學者之一的 Theodore Levitt 便說，全球化是「將世界視為一個巨大市場，而忽視區域與國家之間的表面差異」(Levitt, 1983:92)。他並且指出，全球企業(global corporation) 因為「在各地都以同樣的方式銷售同樣的東西」，所以成本相對較低(Levitt, 1983:92-93)。同時發生的現象，還有同質化、各種文化獨特性的消失、商業化、標準化、以及為了壓低生產成本而對第三世界勞工的剝削。

此一對於「美國－歐盟－日本」三邊最為有利的「全球化」，透過 1980 年代雷根／奈契爾政府以來，對各種領域的「私有化」與「解禁」政策在大力推動著。如同 Roach(1992)所說，

「私有化」之所以蔚為一股世界潮流…明顯地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的全球性策略，以求去除公共廣電制度對於市場擴張的障礙…把公營電訊產業賤賣給私人企業（例如在阿根廷與墨西哥的狀況），或者確保多邊與雙邊的電訊發展援助計畫能夠服務私人企業的利益（例如在部分發展中國家，像是非洲）…簡單地說，私有化反映了資本主義向全球各地擴張、以及把人類所有活動都化成商品的內在需求。

從私有化浪潮中得利的，正是過去認為應該要幫助第三世界帶來改變契機的大眾媒體與電訊傳播財團。在此一過程當中，產生了包括 Viacom、Bertelsmann、Time Warner、News Corporation、Disney、Sony 等大型集團，以及其他中等或較小規模的媒體財團，不斷地掠奪涵蓋第三世界的全球媒體、娛樂、與各個領域的商業利益。這些大型財團傳遞相同的訊息（通常還以相同的語言）—通常是把人們的日常生活，瑣碎地詮釋為各色待價而沽的商品（其中，人也變成一種商品）；對於有違他們利益的消息與新聞，就加以封鎖或扭曲；並且忽視最底層的人民（有時候是會提到他們如何慈善地施捨這些底層人民）。有關後面這個部分，一個例子就是最近美國卡崔納風災(Katrina)中，部分記者的報導挖掘出美國的貧窮問題，但這個議題卻很快地從媒體焦點中消失、不再受到重視。有關人民苦難的報導，並不符合財團的利益—除非這些災難可以轉化為煽色腥的八卦報導、然後銷售圖利。同樣地，出錢出力來拯飢救溺，也不符合媒體企業主的本色—除非這樣做可以滿足他們的私人利益，例如減免所得稅。當前的掌權者，並不是以所有人的利益為考量，反倒是以金字塔頂端一小撮人的利益為優先。

有關全球化的正面與負面影響，Carlsson (2003: 55)作了一個非常不錯的結論。她指出，在這數十年當中，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與貧窮等問題的嚴重性逐漸降低，但是「當世界上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个人每天賴以維生的收入低於美金一元時，全球化可以說是導致、或可能導致貧窮問題愈趨嚴重的原因」，這使得「發展」的未來日趨黯淡。她認為，全球化是有可能「透過貿易、科技發展、以及知識的交流」，來降低不平等與貧窮的問題；但是她同時強調，當前的全球化並非涵蓋全球所有人民，

現在的世界，遠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來得更為不平等，包括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及有權有勢者與無權無勢者的區隔。有

數十億人因為無法參與全球化的相互交流，而在這股趨勢當中缺席。南半球的赤貧國家，以及北半球富有國家中的最貧窮階層，都被排除在全球化的趨勢之外…這種被排除的情況，不只是物質上的問題而已，同時也會導致知識與文化上的問題 (Carlsson, 2003: 55)。

(二) 如同前面所述，對於所謂新資訊科技（或者常被混為一談的「資訊社會」）已經緩解、或者能夠緩解第三世界各種問題的說法，我抱持懷疑態度。Roach (1992)對於她自己提問的「資訊社會是否正在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所做的回答，深得我心：

對於南半球的窮國來說，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資訊社會」的樂觀論述，於 1980 年代時在這些國家中蔚為主流。所以當時許多國家不惜舉債，大量採購電訊傳播設備。不過聯合國發現，1980 年代也正是南半球窮國的「迷途十年」(the “lost decade”)；在這段時間中，所有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都顯示，南半球窮國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獲得改善，反而是愈來愈差。

舉例來說，Roach 指出，聯合國在 1980 年代當中，就新增列了十一個國家為「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使得這個名單的總數達到了四十四個。

我們常聽到有關「新資訊科技可以打破距離限制、打造地球村、壓縮時間與空間、以及帶來媒體數位匯流等等」的說法，但實際上，不管在國際之間或每個國家之內，都仍舊存在著不平等。創新資訊科技的發展，過去很少關照第三世界的人民，這點將來應該也不會有所改變。這是因為下列幾個原因：1. 生活在赤貧當中、每日三餐不繼的人民，根本買不起這些

設備；2. 即便這些人有能力購買電腦與電話等設備，他們也無力負擔比這些設備本身更為昂貴的維護與更新費用；3. 許多國家的基礎建設（例如電力供應），並不足以支援這些新資訊科技設備的使用。當然，最後一個問題，則是這半個世紀以來，相關論調所遭遇的相同質疑：到底這些新資訊科技真的可以幫助社會發展嗎？

（三）我對於「全球化與新資訊科技能夠解決第三世界問題」論調的第三點質疑，在於他們並沒有觸及這些問題的肇因根源，特別是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Lai Si Tsui(1991:81-82) 有相當好的例子來說明這點：

第三世界的衛生醫療的根本問題，並不是缺乏傳播工具，而是缺乏清潔的飲水、足夠的食物、以及基本的醫療設備。要對抗當地的天然災害，重點在於各項基礎建設，而不在於資訊。造成這些問題的直接因素，其實是貧窮—包括土地所有權被壟斷、缺乏銀行貸款的資助、地主與仲介業者的剝削、欠缺灌溉設施、以及高昂的生產成本等問題。這些議題大部分是結構與政治問題…第三世界問題的結構本質，並沒有改變。

（四）我抱持懷疑態度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在 UNESCO 權力大大受限的情況下，哪個組織可以領導發展與傳播的計畫？我們早已明白，作為全球化主要「加害者」與「受益者」的跨國企業，並不會把這個議題當作他們的事情與生意(their “business”)。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將這個責任託付給各國政府，因為這些當權者念茲在茲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如何帶給他們個人好處、以及如何繼續掌握權位的問題。

對於第三世界來說，「國際傳播發展計畫」（International Programme for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簡稱 IPCD）曾經是一個選項；這個單位

的成立，就是爲了處理傳播與發展的議題。IPCD 是依據「馬克布萊德委員會」的建議，於 1980 年成立，最初宗旨是要協助發展中國家，達成獨立自主與建立文化認同的目標。但是，這個單位的絕大部分經費只來自挪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長期處於財力不足的困境；之後更因爲陷入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而喪失了當初設立的原意。

總括來說，我們在 1950 與 1960 年代所遭遇的問題，到現在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並沒有任何改善。這些問題之所以沒能緩解，極有可能是因爲我們根本是在「向鬼拿藥單」，而且一直沒有學到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我在這裡，以一位所謂「發展專家」幾十年以前的醒悟，來做爲結論：

科學與科技可以從國外進口，但從中所能激發的無窮創造力，才是真正唯一的解答。因爲基本上，「發展」並不是科技設備或國民生產毛額的問題，而是新想法的養成、人們心智的革新運動、人們心靈的向上提升、以及人們自信的培养 (Kleinjans, 1976)。

智慧藏

參考書目

- Carlsson, U. (2003). The rise and fall of NWICO. *Nordicom Review*, Dec.: 31-68.
- Casey-Strahmer, A. (1985). Satellites spreading skills for rur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eeds of Change*, 1: 61-63.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lding, P. (1994). The communications paradox: Inequality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Media Development*, 4: 7-9.
- Hudson, H. (1984). *When telephones reach the village: The rol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 Norwood, NJ: Ablex.
- Jayaweera, N. (1985). Assessing communication satellites. *Development: Seeds of Change*, 1: 52-58.
- Jussawalla, M. (1985).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policies. *Development: Seeds of Change*, 1: 64-66.
- Kleinjans, E. (1976). In W. Schramm & D. Lern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n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Krippendorff, S. (1979).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In *Third World mass media: Issues, theory and research* (pp.71-82). Williamsburg: *Studies in Third World Societies*, No. 9.
- Lent, J. A. (1997). Another time, the past; another place, the Philippin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Dec.: 151-156.
- (1988). Devcom: A view from North America. In N. Jayaweera &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p.20-41). Singapore: AMIC.
- (1986).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Myths, questions, alternatives*. Presented at IAMCR, New Delhi.
- (1978). *Mass media, folk media and rural masses in the Third World*.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1974). *Mass medi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our conundrums*. Presented at IAMCR, Leipzig, Germany.
- Lent, J. A. & Giffard, C. A. (1982). The age of awareness in global mass communications. In B. Dervin & M. J. Voight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ume II* (pp.163-201). Norwood, NJ: Ablex.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Levitt, T. (1983).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 UNESCO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oday and tomorrow*. Paris: UNESCO.
- Media Development*. (1994). Public communication -- Superhighway or one-way street. 4: 2.
- Missing Link*. (1984).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Rogers, E. (197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64-69.
- (1969).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1962).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ach, C. (1992). *Trends in global communications*. Presented at IAMCR, São Paulo.
- Roszak, T. (1986). *The cult of information: The folklore of computers and the true art of thinking*. New York: Pantheon.
- Schiller, H. (1969).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Schramm, W. (1979).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1979*. Presented at UNESCO, Paris.
-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acher, E. 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ervais, J. (1985). Towards an alternativ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edia Development*, 4: 2-5.
- Singhal, A. and Sweety, L. (1997).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Everett M. Rog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Dec.: 107-116.
- Smythe, D. (1985). Needs before tools: The illusions of technology. *Media Development*, 4: 8-17.
- Thussu, D.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Arnold.
- Tsui, L. S. (1991). The us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 comparison of perspectives. *Gazette*, 48: 69-93.

智慧藏